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19年散文：

情怀与境界不可或缺

□韩小蕙

2019年是个重要的年份,以散文为代表,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都做了很多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项目。与此同时,文学界以及读者大众对散文的要求也注定水涨船高。

梅岱的长篇散文《走进(敕勒歌)》无疑是分量很重的一篇。该作2.4万字,以“敕勒歌”“敕勒族”“敕勒川”“意犹未尽”共四节连缀,一点一滴地讲述了故乡敕勒川从古至今的历史、地域、民族、血脉、文化、生活、生存、生长……高天厚土,大气磅礴。最精彩处还在于从容的叙述中涓涓释放出的个人对人类生存、世界文明发展的种种感悟与思考。

贺捷生的《么姨的灿烂年华》记述了么姨在极其艰难的革命岁月中,竭尽全力帮助萧克将军完成长篇小说《罗霄军》的故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浴血革命的艰苦,其情感热烈,情节生动,细节感人至深。王巨才的《血脉,涌动不息》披露了上世纪40年代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派干部奔赴东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塞北延安”的悲壮历史;另一篇《夜来风雨连清晓》记述了上世纪70年代,他作为年轻工作人员,跟着“大官”高专员下乡访察农情,那时没有汽车、秘书,随从,没有电话、手机、微信,有的是共产党人急切希望农民富裕起来的一颗红心。两篇作品都洋溢着共产党人奉献革命、奉献人民的无私精神,让人泪目,无限向往。王宗仁写西藏的3部散文集同时出版,篇篇散文作品像陈年老酒,于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朴实、平稳地显示出悠长的艺术魅力。这脱胎于他的人品高度,他18岁入藏,把大半辈子都献给了援藏事业,在平凡而崇高的汽车兵岗位上,他是兢兢业业的好战士,工作之余又拿起笔来表达胸中的千山万壑,逐渐使自己成长为一位军旅作家。奉献与大爱,既是他做人的本色,也是他作品的底色。刘兆林的《太行喊山》写的是山西平顺县人民战天斗地的历史,前天自造土地雷炸鬼子,昨天在山上见缝插针地种树,今天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石头上种树,把土地省出来种谷子。勇敢勤劳的平顺人正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写照。阿莹的《工匠之歌》歌颂了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工匠,这在很多年里几乎是一个被遗忘的话题。通过讲述几位舍身为国的工人劳模的感人事迹,作者由衷地感叹:“工匠是一个民族的精华。工匠是一个民族的柱石。工匠是一个民族的脊梁。”

2019年,多位作家在散文的思想、见识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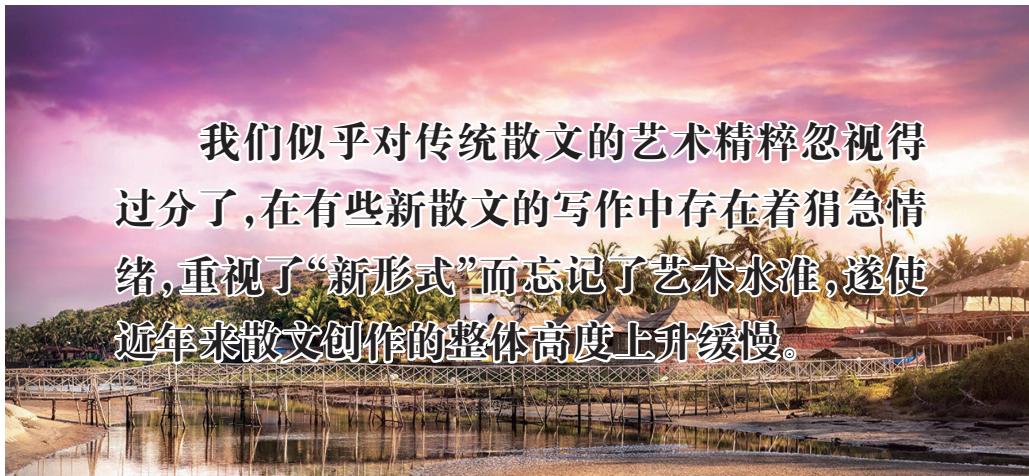
努力掘进:

李国文的《肉食者鄙》是一篇老辣之文,对左丘明与司马迁各自笔下的曹刿,作了一番具有个人判断的分析,并对春秋战国的历史给出了独到点评。我记得最牢的一句话是:“肉食者鄙,其实,不食肉者未必不鄙”,真是独步史坛,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林岫的《笔下“乌龙”几多多》对书法界的弊病直言批评,对有损书法艺术的错误、失误一次次纠正、一次次痛斥、一次次声讨,竭力保护中国书法艺术的纯粹和高贵。岳建一的《融入人类主流文明》是对文学的一次致敬,呼吁“找回文学评奖应有的视觉、听觉、知觉和痛觉,找回最本质的属性,找回文学良知,找回灵魂”,并且提出应该坚信人类主流文明,提倡多元性、回归常识等三方面问题,让我们重新温习了渐渐被遗忘的文学的底线和使命。张映勤的《称呼问题》似乎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其实是久蓄的愤懑发泄,面对着“脸一闹,人就变”的官员们,哪怕昔日交情深到发小、同学、知己,如今也再不能“我自岿然不动”地不称人家的官职。这种人生困境,也是我们大家在人情交往上的公共难题,亦是有特色的中国官场上的“潜规则”,更是社会风气的现实投影。

在2019年的描人散文中,有几篇堪称佳作:章德宁的《道不尽的林斤澜》不仅描述了与林老过往的点点滴滴,更重在对其人品与作品的深刻评价。作者不仅把“林老用一寸一寸生命的坚持,用一寸一寸生命的时间,用一寸一寸生命的长度”给她留下的最宝贵遗言分享给广大读者,还为当代文学史给出了一道思考题。

余秋雨《饶宗颐的香港》通过几个小细节,画出了这位百岁高龄去世学者的几个侧面,为“即使只有一个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而再发声。吴周文在《旭澜师》里怀念著名学者潘旭澜教授,通过几个感人的细节,写出了这位现代文学专家做人的高贵、做事的端正、做学的严谨认真,体现出了老一辈文化人令人敬仰的精神风貌。

在叶廷芳的《我的老哥“乌皮”》中,乌皮曾在叶家当帮工,俩人曾多年睡在一张床上,形同兄弟。他只上过4年学,却一生好学不倦,努力上进。后来有幸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又培养成大学生,最终成为水利工程方面的高级工程师。由于是亲历,作者带有强烈的感情,主人公又是罕见的从长工到高工的人生际遇,作品的文字虽然平实朴素,字里行间却埋藏



我们似乎对传统散文的艺术精粹忽视得过分了,在有些新散文的写作中存在着狷急情绪,重视了“新形式”而忘记了艺术水准,遂使近年来散文创作的整体高度上升缓慢。

着一种感人至深的心绪,同时还表现出了大时代的波澜壮阔。

程绍国的《父亲是程颐的后代》也是一篇奇文,写的也是一位农民,父亲其实是养父,生父倒是一位吃官家饭的干部。这位只能被按在地里刨食的农民,想给养子创造好的生活条件而不得,因而终日焦虑、无助、忧郁、愤恨、自责,最终因癌症离世……往上寻源,他真的是程颐子孙留在温州的一支,光阴更替,时代转换,人生其实是厚重的。

徐风的《你不知道我最缺什么》非常可贵,主人公老陈是一位进城卖菜的农民工。因为对土地的眷恋,他坚持种自家的十几亩蔬菜,自家吃不完才到城里卖菜。他学会了用手机收费,也学会了用微信了解国家、世界大事并且津津乐道。他一年也就赚几块钱,可是却愿意周济更困难的打工者……在他身上,我们不仅发现了种种新的社会元素,更可贵的是发现了新的社会人,他们是农民、进城务工者,这是徐风此文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惊喜。

与此同时,在对散文艺术水准的追求上,作家们一点也没放松。

陈世旭的《追随一条江》写风景如画的浙江桐庐吊严子陵,满篇文字皆如诗一样美丽,而其中亦见历史观,以及作者对个人命运的思考,实乃上品之作。王剑冰的《扬州慢》亦诗亦画,纯美的意象、精美的句子、静美的心境,真是美文不负美景。王剑冰的文字华贵如诗而来,意境臻于珠圆玉润,这对于一个已有几十年写作经历的作家

来说是让人惊艳的上升。刘汉俊的《乌镇的早晨》也是一篇全方位的彩色的诗,“历史的水榭歌台,只等捕捉你的目光。你纠缠你的,唯美的乌镇却给自己留出许多闲散,像国画里的枯笔飞白……”通篇皆是这样纯美的诗句文词,既是风景引领了作者的文思,同时也用文思带起了风景。

陆春祥的《惊蛰》从形似(猪)的雷公(引自李肇《唐国史补》)写起,至《太平广记》《录异记》《广异记》等古籍,又至韦应物的《观田家》、陆以湑的《冷庐杂记》、褚人获的《坚瓠集》,最后落在美国作家迈克尔·麦尔德的《东北游记》,读书之多让人佩服。洋洋洒洒,信手拈来,读来趣味横生,不忍释卷。

刘成章的《带着风声的花》借着山丹丹花好一通抒情,虽然已离开陕北多年了,但作者对家乡的感情却越来越浓,陕北在他的笔下也越来越呈现出诗意美。刘成章近年来写了包括海外生活的不少其他题材作品,但横过来看过去瞧,还属其写陕北的散文最见精神。还有一篇南方女子写陕北榆林横山的作品让人过目不忘,杨海蒂的《北面河山》文笔刚烈、大气磅礴,纵横历史、思接古今,一代代王侯将相从笔下滑过,一位位革命家跃然纸上,一个个诗人和艺术家唱着信天游走来,演绎出古银州的今昔与未来。而周华诚的《鱼鳞瓦》写得山清水幽,普普通通农家房屋上的鱼鳞瓦,将江南的厚朴与宁静之美衬托得活起来了一般。

此外,几位少数民族作家的文笔像诗歌一样

华美绚烂,如杨俊文(满族)的《不落的船歌》、阿舍(维吾尔族)的《像风一样》、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哈萨克族)的《呼苏木奇》、艾平(蒙古族)的《上海的绸缎草原的香开》等,他们似乎生来就能歌善舞,出口成诗,用诗的诗句呈现散文,把散文表达得美轮美奂,这也许是成天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我们很难企及的。

还有一批写作很多年、越写越上升的作家,殊为难能可贵,如徐刚、朱以撒、孔见、孙郁、黄文山、杨闻宇、穆涛、葛水平、杜卫东、素素、马力、朱鸿、潘向黎、王兆胜、熊育群、彭程、李舫、苏沧桑、周晓枫、柏峰、刘江滨、毛眉、甫跃辉……他们都在散文园地坚持了多年,不仅保持着创作的数量,而且精益求精,在艺术追求上呕心沥血,是中国当代散文的中坚力量。

20多年来,散文界一直在大力提倡、大声疾呼“革命”和“创新”问题,竭力打破传统散文的陈规,把自己从“耽于唐诗宋韵”和“茶余饭后千字文”等旧有模式中解放出来,并且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功。但现在,我却也产生了一些许惆怅,因为革新固然必要,但正如鲁迅先生说过的,倒洗澡水的时候不能把孩子也一起倒掉。我们似乎对传统散文的艺术精粹忽视得过分了,在有些新散文的写作中存在着狷急情绪,重视了“新形式”而忘记了艺术水准,遂使近年来散文创作的整体高度上升缓慢。我愿重新回到原点寻觅:什么是散文?好散文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卓然说:“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诗人,各自都有自己的世界,唯独散文家没有;然而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诗人的世界,又都是散文家的世界。只有散文家才可以很随意地到达哪个王国去遨游,把那里的最精华部分收拢到自己的襟抱之中,和了清风,糅了明月,经过烧炼、锻打、淬火,到百炼成钢化作绕指柔时,便是散文了;经过摩挲、蒸煮、散晒,到老窖中溢出了醉人的酒时,便是散文了……”但我更想强调的还不是散文的艺术性问题,而是它所能或缺的情怀和境界。自古“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到了今日,为什么在有些人那里,散文只是变成了风花雪月、吃喝玩乐、声色犬马?中国知识分子一贯奉行的“先天下”家国情怀,也变成了“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各色精致利己主义?此乃当今散文创作的最大短板,如能力克之,方显出山高水长,海阔天空。

(上接第1版)刊物还将于今年第3期文学版、第4期纪实版推出“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特辑,精选征文中优秀的诗歌、散文及报告文学作品全文刊载。杨敏平的《疫情让我们警醒》讲述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生活状态与心理变化;张好好的《愿人间总是好时光》表达了作者期盼疫情早点结束,人间春光永驻;叶浅韵的《灾难后的重建:推动人类文明的契机》思考人与自然尤其是人应该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其他像《“疫”不容辞》讲述了列车员抗击疫情的亲身经历,《在泰国寻购口罩》讲述了作者在泰国购买口罩的辛苦经过,《蝠与福》讲述了代表福文化的蝙蝠与人们的贪念。这些作品深入挖掘抗击疫情中发生的感人故事,凝聚正能量,致敬逆行者。2月16日,《中国作家》在官方网站开设“免费阅读”栏目,陆续刊发往期文学版、纪实版刊登的《新世界》《战国红》《穿插》《中国钾——时代楷模李守江纪实》《中国天眼:南仁东传》《晋江奔流向海》《中华水塔》《万里瞻天红旗扬》等获奖作品,为身在疫情防控战中的每一位读者加油打气。

《小说选刊》自2月1日起在微信公众号推送中国作协抗击疫情新闻报道,并及时转发中国作协各部门各单位组织创作、刊发的抗疫精品。自2月6日开始,《小说选刊》在微信公众号推出“抗击疫情,公益阅读”栏目,已经推出班宇的《凌空》、鲁敏的《火烧云》、龙一的《长征“食谱”》、周瑛璞的《星期天的下午茶》、王军的《漫话红学》等作品。截至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作家联系《小说选刊》杂志社,要求加入作品公益阅读的队伍,将更多优秀作品与广大读者分享,鼓舞大家早日取得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伟大胜利。

作家出版社2月4日作为倡议单位参与了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大众数字出版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大众数字出版行业抗击疫情倡议书》,加入抗“疫”队伍。2月5日,作家出版社积极响应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新闻出版局的号召,加入“战‘疫’+我一个”行动中,把“作家在线”网站的在线阅读和在线写作免费开放给用户。2月1日至4日,作家出版社在微信公众号上开始连载儿童文学作品《皮卡兄弟:不一样的春天》,并同期转发杨红樱节选作品《大雨野味餐厅》。2月7日起微信公众号开始发起“抗击疫情,共读书”朗读书经典图书活动,每天发布一期制作好的读者朗读作品。已经发布毕淑敏《不确定性的忍耐》、王祥夫《知风草》、张之路《吉祥时光》(节选)、周国平《家》、林清玄《心静下来,就闻到香气》、罗贯中《三国演义》(节选)、毕淑敏《花冠病毒》(节选)、尹建莉《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等作品,并每天同步发布“平安小书单”,向读者推荐作家出版社经典文学作品。此外,微信公众号同期还转载了《细胞战斗实录!新冠肺炎原来是这样被治愈的》《勇担使命 同心抗疫》《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等作品。目前,作家出版社已经着手将近期中国作家协会所属报刊社网发表的抗疫作品集结出版,并以“同舟共济 众志成城”为主题策划一系列抗疫选题图书。

非常时期,共克时艰。作为国内颇具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文化品牌,作家文摘报社响应国家号召,不负担

当、守土有责,齐心协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近一个月来,《作家文摘》以丰富多彩的版面内容助力抗疫:包括头版重磅文章《防控疫情 中国在行动》《全球防疫,中国不孤单》《从战“疫”动员看中国社会深刻变化》,更安排不同版面从时政、历史、世态、文艺入手,多维度、全景式地描摹了这场人民瞩目的疫情防控攻坚战,如《“最刚”医生张文宏》《火神山医院10天落成记》《科技防疫突围战》《企业如何借鉴历史渡过难关》《居家时光这样充电》《1918年致命流感的教训》《日本的捐赠物资上为何写着这八个字?》等近40篇精选文章,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此同时,《作家文摘》微信公众号秉承“抗疫,我们的陪伴不缺席”,坚持每天免费推出精品内容,以《毛泽东(送瘟神)诗中的为民情怀》《独家专访刘醒龙:无论完胜惨胜都要为武汉立座纪念碑》《你们摘掉口罩后,真好听》等多篇好文“圈粉”无数。他们表示,抗疫,《作家文摘》的陪伴不会缺席!

《中国校园文学》于1月28日通过微信公众号发起“抗击新冠肺炎”主题征文活动,面向广大师生、儿童文学作家征集反映万众一心抗击新型肺炎的日记、散文、小说、诗歌,并于1月30日起每天推送征文来稿选登。截至目前,已经收到来稿1500余篇(首),公众号推送抗疫作品19篇,推出21位诗人的28首诗歌。1月28日启动了“爱在人间——《中国校园文学》抗击新冠肺炎公益插画”征集活动,截至目前已经收到50多位插画师的近百幅作品,并在每期微信公众号推出的抗疫作品中配图推送20幅。在第三期刊物中,专门开设了“抗击新型肺炎”主题征文栏目及“爱在人间——《中国校园文学》抗击新冠肺炎公益插画选登”栏目,刊发优秀来稿和插画,封面也专门设计为抗击疫情相关的插画。

中国作家协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发挥网络媒体优势,网站及其微信公众号、微博坚持每天正常更新,及时转发、宣传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全国人民疫情防控的有力行动,及时关注重要时政,准确转发,形成了较为顺畅的工作机制,确保编辑全天在岗,当日新闻当日报,精选《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重要媒体的评论员文章和典型人物、事迹的深度报道,传播主流声音,传递“战疫”正能量。突出报道文艺界尤其其文学界在疫情防控中的实际行动和主题创作,策划完成《作家们的朋友圈》,有这样一份温暖》主题报道,每天从全国各地的文学报刊中精选新闻、文艺作品、理论文章,主动了解各地作协相关工作信息,使中国作家协会成为集中反映文学界参与战“疫”的窗口,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舆论支持。充分利用原创投稿平台吸引广大作家尤其其基层作家创作相关作品,反映自己身边的“战疫”故事和生活感受,通过微信等平台推出原创诗歌,并结合网站“每周之星”栏目,持续推出一批比较有分量的作品,尤其是北京作协会员琅琅的短篇小说《空车厢》,创作时间短,构思巧妙,情感真挚,在以诗歌和散文为主体的创作中尤其突出。

(本报集体采写)

■新作快评 马平中篇小说《我看日出的地方》,《人民文学》2019年第9期

白石头和紫薇树

□敬文东

马平是性情中人,据他介绍,其中篇小说《我看日出的地方》起于某个夏日他与一些树的偶遇。如今,他竟将最念念不忘的那一棵,从成都郊县的某个园子移植到小说当中。与树的偶遇成就了一部传奇。

饶是说“奇”,小说中的故事倒也算寻常:写青梅竹马爱而不得,讲生离死别和怨怒纠葛。情调悲伤,小说家下笔却不重,哭天抢地或摧心剖肝的场面并未随着绝别和死亡的到来而降临,正如标题之语,小说通篇只是弥散着清晨时分静寂的气味,应和着日出的节奏,缓缓向前推进。

马平似乎有意将小说的步调放慢。他让主人公金春早出任小说的第一也是唯一的叙述人。叙述人开篇便坦白,“我”在讲述的,乃是12年前的事情。既是回忆,必将掺入修改与再想象的成分。回忆总是追着时间的脚步向四面八方散开,而堆叠记忆,附赠遗忘,这是时间的规则。诚如热奈特所言,小说或许“时而是记忆或不如说忘却的作品”。《我看日出的地方》遵守着记忆的惯性,始终保持低速。一方面,低速暗示叙述人“我”渴望能够如实回忆往事的自觉与诚恳;另一方面,也匹配着“我”久居山窝的行走速度。在小说中,“我”几乎从来不“跑”,总是以“走”的姿态小心步入生活。能够看出来,“我”并不擅长奔跑,也不迷恋快速。一个喜爱看日出的人,怎么会步履匆匆呢?在“我”谨慎的回忆中,在那条曾和姜樱子同行回家的小路上,“我”刻意放慢脚步,落在樱子身后,以便能够久久地注视“那人世间最好看的背影”。如今,“我”借一场回忆将旧事重提,日出的片刻和樱子的背影都在回忆中凝结成永恒的画面。可以说,低速是“我”一贯的生活节奏,也是“我”面对芜杂人生、回眸来路的方式。

冷静、迟滞的情感氛围以及人物行动的慢速度,同时降低了小说的音量。日出放慢“我”的脚步,也教会“我”压低嗓门:在牛耳村时,“我”只是“轻声喊着姜樱子”,进城后打电话,也只是“轻轻叫了一声:‘爹……’”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绝少制造噪音。孱弱多病的姜樱子无论说话、做事,都是“轻轻地”、“细声细气地”,仿佛不能也不愿意在生活的表层划下一点痕迹,就如同企盼日出时,小心翼翼不敢发声的喘息。小说关掉一些声音,让故事人物在耳根清静之际,意外地听到另一些声音在答应,比方,树与石的声音。

小说的人物都是些凡夫俗子,于光阴中耽误蹉跎,逃不过肉体消散和命运的折磨。树与石,却惹上奇情灵性,早早将命运的启示写到盘根错节的躯干中,也刻在每一道被风霜割裂的纹路上。

“我”的父亲,那位极其普通的乡村工匠,就听到了一块白石头的呼喊。父亲涉水“救”下这块同样平凡的白石头,安顿在家门前的紫薇树下。面对现代社会负荷运转的现实,卡尔维诺

曾说:“在某些时刻,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变成石头;这是一种石化,随着人和地点的不相同而程度有别,然而绝不放过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我看日出的地方》中的白石头,或许就是从卡氏那里搬来的?虽然,点石成金的奇迹从未在“我”父亲身上发生过,石头却成为老人最忠诚的伙伴。父亲在初见时便看穿石头伪装的沉重,他想:“白石头像一条狗,他打算用锤子和凿子把它朝着狗的模样修一修。”十多年后,“我”借回忆翻看往事,频频撞见父亲独自坐于白石头之上,好像在倾听石头的心跳,数着途经树下的岁月。在无数个早已逝去的阖家暗夜中,白石头坚毅的心跳为朴实的父亲刻下一块无字的纪念碑。

紫薇树的语言则是赤诚而纯净的,像“我”的质直心地,也像樱子永远青春美丽的生命。这棵老树能开两色花,替“我”和樱子将最年轻的爱都结在枝头。两个不善言辞的男女都听见,也听懂了紫薇树声音深处的心意。卡尔维诺捏造过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子爵的同一副躯体分裂成两种极端对立的生命形式。紫薇树亦是如此。马平在小说中栽下紫薇树,搬来白石头,画出一个独特的情感原野。从这个原点出发,更完整地追索生命象限中那些因人而异的“感”情方式。

“我”对樱子付出长久的守候,徘徊于城与乡之间找寻一棵树的踪影。樱子自愿为命运淹没,被一潭湖水回收,来交换紫薇树的安宁。可以说,樱子和“我”都具有日光养成的品格:初时柔和,在流逝时光中镀上耀眼的光辉。与“我”和樱子不同,“我”父亲更习惯同“月亮”走在一起。许多年来,他都在深夜外出,到过世妻子的坟前说话。普照万物是太阳才有的气魄,父亲知道月亮只愿给未亡人亮一盏小灯,将白日里不与人诉说的情与思涂抹在冷淡的清辉中。马平和他制造的故事人人都知晓日与月的失落。因此,他决定和叙述人一道,于光明寂灭处,巧手一拂点亮星辰。“我”在痛失樱子的岁月中,幸运地遇上了一位名叫青桃的女孩。不过,未经人事的青桃对日出并不感兴趣。从“我”的讲述中可以发现,在这个世界上,青桃渴望得到的东西和她所占有的东西一样少之又少,就像我们的时代里,那些绝非好天气否则肉眼难寻的星星。面对“我”在“看日出”一事上几近疯狂的偏执,青桃发出了一个“我”似乎从未想过的疑问:为何不“望星空”?

日月星辰是一道,照亮小说每一个抒情的暗角。马平用回忆的结构,配以慢速度和低音量,使“我”十多年来的生活在“日出的地方”交相辉映。只是不知现实和往事之间,又有多大落差呢?朱朱《拉萨路》一诗,在小说的远处点破这个事实:“你向我们展示每个人活在命运要给他的故事/和他想要给自己的故事之间的落差,这落差才是真正的生活,此外都是俗套……”马平铺展他的小说,就像翻开生活静默的册子。在这段故事里,人和人,树与石,一同来猜命运的谜底。